

## 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紀實

柯博識\*

### 摘 要

羅馬教廷在有名望的中國天主教徒的積極倡議下於 1925 年成立北京公教大學。教廷要求美國本篤會接下辦大學的任務。在美國經濟大蕭條在 1930 年開始後，本篤會無法繼續承受經營輔仁大學的財務負擔。於是教廷要求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

雖然他們無法募足足夠的款項並欠了很多的債，但是為本篤會來說放棄輔仁大學是一件痛苦的決定，因為為了成立和發展輔大在頭八年中，他們投資很大的人力及財力。最後輔大的一切財產從他們手中被奪走了，並留下巨大的債務。

聖言會之所以被邀請接辦輔大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傳福音有效力並在美國有了蓬勃的年輕分會的傳教修會。他們在中國也有不少傳教士，雖然不曾辦理大學以及沒有很多有教授資格的會士，但他們認為教廷的邀請是個福傳的大挑戰而願意為此付出大的代價。因此他們從世界各地找適合的人才，尤其是正在大學進修的會士來輔大服務。他們第一年只能勉強的能擔任大學最重要的職務。但像本篤會一樣，最大困難還是財務方面，每年只有最起碼的預算工作。

中國籍的教職員對學校的轉移有很多的憂慮，但是他們都留在崗位，後來也能很快的跟新來的負責任的團隊合作。

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轉移在輔仁的歷史是個相當危險的關鍵時刻，很幸運的輔大繼續發展並在 1930 和 1940 年代變成北京和中國有名望的大學。

關鍵詞：辦大學、辦學經費、教育領導團、教育機構的轉移、天主教大學

---

\* 聖言會神父。

## 序 論

在當時傑出有名望的中國天主教徒積極倡議及奔走下，教廷於一九二五年諭令成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早在一九一二年時，馬相伯（1840-1939）及英斂之（1867-1926）二位先生已上書籲請教廷在北京創設非黨派的純正天主教大學，希望藉此提高華籍聖職人員的教育水平，加強對中國知識份子廣播福音的工作，並且協助中國面對現代化新世界的挑戰。

羅馬教廷要求美國本篤會加西尼聯會接下在北京成立天主教大學的任務。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他們接受指令，但將計劃的執行委由賓夕法尼亞州聖文生總會院，並承諾：所有其他會院皆會提供財力及人力支援。聖文森會院奧瑞留斯·司泰萊（Fr. Aurelius Stehle, 1878-1930）總院長被委派為監督全權處理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事宜。托雷多教區的教區神父、聖文森學院的教授、及本篤會的獻身者——喬治·巴瑞·奧圖爾神父<sup>1</sup>曾至北平訪問並鼓吹此辦學計畫，故獲任命為校長。一九二五年三月時，租用了滿清貴族載濤的濤貝勒府為校址，同年十月一日成立了「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英文名為“M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由英斂之出任社長。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英斂之社長過世後，此「國學部」添授英文、數學等課程當作大學的預備科。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由國民政府正式核准，校名為輔仁大學。一九二九年時增設理學院和教育學院，以符合教育部對大學的規定。一九三〇年—三一年學年度初，全新教學主樓落成。

## 財務及其他困境

斥資增設兩個學院及建造一棟新校舍，使本篤會承受巨額的財務負擔。為了蓋校舍大樓及支應其他支出，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初向紐約花旗銀行貸款二十五萬元，利息百分之七，約定於十八個月內償還。司泰萊是以北京天主教大學監督的名義借款，因為他並未得到聖文森會院會議同意授權借貸。但當月底股市崩盤且美國經濟大蕭條開始後，要

<sup>1</sup> 奧圖爾神父，1925-1929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29-1933年任校務長奧圖爾神父（George Barry O'Toole, Obl. S. B, 1888-1944）美國俄亥俄州托雷多教區神父，美國聖約翰大學文學碩士，1912年在羅馬讀神學博士，1917年在本篤會聖文森大學教哲學，1919年在西東喜大學 Seton Hill College, Greensburg 教生物學，192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生物學，1925年1月15日被司泰萊任命為第一位北京公教大學校長，1925年9月就職，1926年1月回美國組織為輔大作募款的活動，1927年3月回北京準備秋季成立大學第一個學院，就是文學院。他教哲學，1927-1933年哲學系的系主任，1944年病故。

募款獲得收入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更別提要償付為學校所借款項。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過世，很明顯是因為負擔的壓力過重、心力交瘁所致。從來不曾熱烈支持聖文森在中國的工作的艾佛烈·柯區神父（Archabbot Alfred Koch, 1879-1951）繼任為新的總院長，就任後他前往羅馬商討輔仁大學的財務問題。他明白指出學校每年基本支出就需要七萬五千元經費，這已超過美國加西尼聯會修會團體所能籌募到收入，更別提要償還先前的借款——該筆借款加上利息已逾四十五萬元。教廷同意將傳信部每年的補助金從一萬五千元增加到兩萬五千元，但堅持由本篤會繼續輔仁大學的辦學工作。教宗並未任命柯區總院長接任司泰萊留下的北京輔大監督一職，而是指派原已在北京輔大任教的法蘭西斯·高福德神父<sup>2</sup>擔任。柯區總院長相當高興這樣的安排，因為本篤會會院和輔仁大學兩者便能有所分隔，如此一來，學校才能慢慢的脫離姆院的供養而自力負擔財務問題。<sup>3</sup>不過，學校在一九三〇年時呈現良好的進展：在該學年初新校舍落成，新設的理學院及教育學院也聘用了足額的合格教授，所招收的學生人數也有大幅的成長。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為輔仁大學的第一屆畢業典禮，完成文學院四年大學課程的共有十一名學生。此後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確定性的認可。

在財務問題外，學校的行政管理方面也有狀況。輔仁大學有兩個管理系統：一是伊德風神父，<sup>4</sup>他是北京本篤會約二十人修會的團體上司；另一是教廷派任監督的高福德神父及大學校務長奧圖爾神父。由於輔大是由本篤會負責，而伊德風神父身為其代表並為北京本篤會會院的院長，認為凡是本篤會教授的派任或是大學預算都必須先徵詢他的意見。不過實際運作卻非如伊德風神父所願。奧圖爾校務長認為他只需向教廷所指派的監督高福德神父負責，所以他們兩位可自行決定學校事務。始終未經伊德風神父許可就自由花費學校的基金，甚至用於支付與校務無直接相關的事務，而且不經背景調查便作出聘用教員的決定。他們也自行對外以學校名義募款。這些內部衝突破壞了校內的合作，而且金錢使用十分浪費。<sup>5</sup>當羅馬方

<sup>2</sup> 高福德神父，1930年8月11日被任命為輔仁大學教會監督高福德神父（Francis X. Clougherty OSB, 1895- ），美國賓州布拉道克教區神父，1920年獲得馬里蘭州艾密茲堡的聖馬麗修道院 Mt. St. Mary's College 文學博士學位，1921-1927年在河南省開封市創設美國式的高中學校：培文中學，1921-1923年在鄭州大學教英文文學。1927年到輔大，1928年在輔大入本篤會，1927-1930年任訓育部主任兼教授英文文學，1933年回到開封在光復中學教書，1948年回美國。

<sup>3</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56-57頁。

<sup>4</sup> 伊德風神父（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1869-1945），生在德國美籍本篤會士，美國聖文森會院副院長，1924年7月8日來北京，聖文森學院文學碩士，教拉丁文，現代歷史，任北京本篤會會院院長，1933年離校到開封在光復中學教書，1945年病故。

<sup>5</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8-69頁。

面與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1876-1958）<sup>6</sup>要求伊德風院長離職時，柯區總院長於一九三二年五月間前往北京訪視，親自調查並了解修會和大學的情況。柯區總院長認為伊德風神父是個優異的會士和術德兼備的人。主要問題在於北京修會會士們散居在舊濤貝勒府各建築和大學校區各處，因此他們缺乏一所合適的共同會院以供正常修道生活。不過問題的核心似乎是肇因於這些本篤會會士們分別來自於不同的獨立修院，尤其是像高福德、奧圖爾他們原本不隸屬於本篤會。即使高福德在一九二八年時發願加入本篤會，而奧圖爾成為聖本篤的獻身者，但原本是教區神父的他們生活習慣本就不同，要改採本篤會嚴謹的修道生活實為不易。因此，在北京本篤會會士中衍生成兩個小團體各行其是，對彼此的生活方式或是校務管理互不認同。<sup>7</sup>柯區神父認為在目前已經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伊德風院長已無法恢復紀律、管理會士。因此，柯區神父不再由聖文森會院找人，而指派來自明尼蘇達州聖若望會院的貝索·史泰門神父（Fr. Basil Stegmann, 1893-）取代伊德風神父。但是史泰門直到一九三二年底才到達北京就任。那時本篤會在北京的命運則幾乎已經確定，<sup>8</sup>沒有他可努力的空間了。

柯區總院長在回美國時途經羅馬，向教廷提出他此行對學校狀況的調查報告。八月份時，美國加西尼聯會召開大會，會中柯區總院長對與會人士說明學校現況，而且特別提到了羅馬當局的態度。教廷對於輔仁大學的困境及美國本篤會的表現感到失望。教廷認為美國本篤會會士對北平辦學計劃已熱忱不再，並且吝於資助。全世界都在關注，若是計劃失敗將帶來大劫難，非但使教會蒙羞，也會招致各界對本篤會的責難。因此，他鼓勵美國本篤會應該再度盡全力支持輔仁大學，每個會院每年至少應捐助四千元。不過，柯區總院長其實心裡有數，在不景氣的狀況下這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而且他對於各會院院長們會否齊力襄助輔大其實也不抱期望。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柯區總院長悄悄地發了一封電報到羅馬告急，內容表明聖文森會院及美國加西尼聯會已無力再挹注資金給北京輔仁大學，並且請求教廷接管該機構的財務責任。<sup>9</sup>看來這促使了羅馬方面正視問題並著手另為輔大尋找其他接辦的修會。

在一九三二年底美元再度大幅貶值，財務吃緊，奧圖爾回美國企圖募款。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時他向美國的主教們募得了近二萬五千元，之後他

<sup>6</sup> 剛恆毅（Celso Constantini）總主教於 1922-1933 年間為宗座駐華代表。他以推行「本地化的傳教」（也就指是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要因地制宜，使基督教適應華人社會文化）及發展中國基督教藝術聞名。

<sup>7</sup> 參見聖言會檔案：1933 年 6 月 24 日苗德秀致葛林德信函。

<sup>8</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3-66 頁。

<sup>9</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7 頁。

到羅馬希望能得到還不足的二萬元，以支付該學年度的支出。

## 最後的決定

然而當奧圖爾抵達羅馬時，他聽說教廷傳信部已著手將輔仁大學轉交其他教會負責。依剛恆毅總主教的提議，輔大將交付給聖言會。在三月八日奧圖爾與聖言會總會長會晤後，他了解學校轉移已經成為事實了。他立刻聯絡美國加西尼聯會總會長艾爾昆·杜區 (Alcuin Deutsch)，請他速來羅馬針對學校行政權改變的利弊得失共商對策。杜區與柯區皆了解如果他們無法保住輔仁大學，必將遭受責難。他們也從北京方面得知剛恆毅總主教被召到羅馬。在剛恆毅總主教離開北京前，他威脅說，如果各會院院長不趕快提供財務支持的話，大學就會從他們手中被拿走。教廷方面似乎認為本篤會有能力但只是不願意幫忙。當杜區於四月初抵達羅馬時，教廷方面請他以美國加西尼聯會會長的身分保證能提供學校運作所需的資金，但杜區不認為自己有權做此決定。教宗碧岳十一世賜見他時嚴厲地告訴他：「本篤會是個『沒有紀律的修會』(an Order without order)」。<sup>10</sup>爾後傳信部就決定將輔仁大學轉交由聖言會接辦。同時還決議當初在紐約花旗銀行的貸款仍由聖文森會院償還。柯區總院長的回應如下：

真是慷慨大方啊！我們把學校的資產送給聖言會，然後還得自行負擔債務。聖言會得到價值五十萬元的財產，而我們有幸承擔償付二十五萬元負債一事。只要我在位一天，我絕不允許此事發生。法律是站在我這邊的。

然而六年後，梵蒂岡及美國法院皆認定聖文森會院必須負責償還借款。<sup>10</sup>

## 聖言會的態度

在一九四一年至四六年間曾於北京輔仁大學任教的包敏神父 (Fr. Bornemann)，之後成為聖言會歷史的編輯者。依他的記載，早年曾是聖言會會士的柯區總院長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從北京行回來時曾去羅馬拜訪聖

<sup>10</sup> 參考資料：傑若米·歐特金 (Jerome Oetgen) 所著美國芝加哥天主教大學出版社 2000 出版之《美國聖文森總修會傳教史》(*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347 頁及 387-406 頁。經過長年法院訴訟及羅馬教廷的決議，終於在 1940 年解決這筆借款。其中三分之一由本篤會負責清償 (主要四萬五千元由聖文森會院負責)，剩餘款項則由密爾瓦基和紐約的主教轄區來償還。請參見《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9 頁。

言會。「他現在身在羅馬，以一個本篤會總院長的身份，和曾教育他的聖言會總會進行談判。當然他的提議是由聖言會接辦北京輔仁大學。如果聖言會同意，那麼羅馬教廷有關的各部會，以及教宗碧岳十一世最終也會認可。」<sup>11</sup> 在當時似乎只是提出由聖言會接手的可能性。直到十月二十三日，總院長才認真的與梵蒂岡討論本篤會無力財務援助學校一事。隔年的二月九日，聖言會獲知因為學校財務吃緊、幾近無力支持的狀態，但教宗不希望見到學校結束，所以屬意並要求聖言會接辦學校。聖言會得知來自監督的秘密報告，其中對校方艱鉅的狀況有詳細的描述。<sup>12</sup> 聖言會總會仔細討論此事之利弊得失。除了把此事視為上主旨意、服膺教宗指示、榮耀上主與教會等宗教理由外，接辦學校也被視為極佳的傳教工作，畢竟福傳正是聖言會的宗旨及使命。其他實際的理由還有：把此工作視為挑戰，此將刺激這個年輕修會的成長，聖言會也將獲得眾人的尊敬及影響力，並且也可藉此展示聖言會不是如傳言所指的只對做生意和賺錢感興趣，他們也願意犧牲奉獻。透過辦大學，聖言會可以將其會士著名的宗教科學知識廣為傳播。相信熱愛科學的聖言會創辦者也會滿意於這樣的決定。反对接辦的論點有：聖言會缺乏辦學方面的人才，輔大的美國身份，在北京的本篤會士和法國遣使會士可能會不悅，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財務問題。針對最後這一點他們做了更仔細及周全的考量，也因此提出一些對應的條件。一、聖言會將不會承接校方任何短期或長期的債務。二、聖言會的傳教資金不得被動用來支應校務營運支出，所有經費應來自於特別募款。三、為易於募款，教宗應聲明輔仁大學直屬教廷，並鼓勵所有天主教徒支持該校辦學。四、該學年度仍應由本篤會管理直到期末。五、期末後學校應交由宗座駐華代表，再由其將學校交付給聖言會，財產所有權也應明確分清楚。六、輔仁大學應該屬於教廷的，只有使用權是交托給聖言會。

聖言會總會二月十三日報告在上述條件下，他們同意接辦輔仁大學。教廷傳信部也在二月二十二日表示同意。同時，奧圖爾校務長抵達羅馬，稍後美國加西尼聯會總會長艾爾昆·杜區也來到羅馬。最後，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也在四月初到達羅馬。於是羅馬教廷和本篤會進行最後的

<sup>11</sup> 見包敏 (Fritz Bornemann a.o.) 著,《聖言會傳教史》(*A History of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Rome 1981), 第 310 頁。

<sup>12</sup> 聖言會總會檔案保管處 (簡稱聖言會檔案), 羅馬 641 案, 1933-34 年: *Kurze Zusammenstellung der Verhandlungen betr. die Uebernahme der Kath. UNIVERSITAET in PEKING durch die SVD* (檔案編號 7018)。這份報告應該是指“Promemoria de Prioratu S. Benedicti in Urbe Pekino necnon de Universitate Catholica Benedictinorum Pekinensi”於 1932 年 7 月 5 日由剛探訪過北京輔大的柯區總院長而非高福德監督所寫。(見歐特金之 *Mission to America* 第七章註 26)

協商。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sup>13</sup>之後曾寫信給山東兗州府主教韓寧鎬（1862-1939），<sup>14</sup>信中說聖言會與教廷的協議需要更長的時間，而接管學校一事要到四月份才能告知在中國的聖言會傳教士。理由是因為

奧圖爾博士不智且輕率的行動，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從人的立場來看他所呈現的品格不是很高尚的。也因為如此，才有這近兩個月的「間奏」。此時我們原則上一切採取被動，一方面絕對不願意介入（本篤會跟教廷的關係）。另一方面，僅管是教宗諭令，我們對於接受新工作戒慎恐懼……。另一個大問題是，即便我們能取得傳信部的官方文件，我們獲得的資訊仍舊完全不夠，甚至有部份是錯誤的訊息。以後我們清楚看到在北京也有許多反對聲浪，以及有真正的陰謀詭計在進行。<sup>15</sup>

在四月八日及九日與剛恆毅總主教商討聖言會的接受交辦聲明，這份最後構思完成的文件<sup>16</sup>在四月十三日交由傳信部。增列了更多細節如下：以北美會省之名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以確保輔仁能續有美國機構的形象；聖言會將盡力保存學校現有的組織架構及人事安排，尤其是若奧圖爾博士<sup>17</sup>願意，聖言會希望他能繼續留在輔大擔任哲學系系主任；聖言會也希望本篤會修女們能繼續負責輔仁女院的部份。密爾瓦基總主教史崔區蒙席（Msgr. Stricht）的資金<sup>18</sup>應當用於償付欠花旗銀行的借款；聖言會將不負責在該學年結束前的任何債務。四月二十九日時正式告知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一事。<sup>19</sup>在四月二十九日後，聖言會才能正式開始接辦事宜。原本

<sup>13</sup> 葛林德神父，1933年8月5日被教宗任命為輔仁大學教會監督直到1947年葛林德神父（Joseph Grendel, S.V.D. 1878-1951），德籍聖言會士，在羅馬讀神哲學，在奧地利維也納聖言會聖嘉博天使神哲學院教書，1932-1947年做國際聖言會總會長

<sup>14</sup> 韓寧鎬（Augustin Henninghaus SVD）生於德國，於1886年加入聖言會並來到山東。1904年至1939年間，他出任山東南部教區的主教。

<sup>15</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葛林德致韓寧鎬信函。

<sup>16</sup> 全譯文參見附錄一。

<sup>17</sup> 奧圖爾是在剛恆毅的特別請求下而被邀請留在輔大任教。雖然奧圖爾是位受人敬重的學者，他為學校的付出也是有目共睹，但在北京的聖言會會士們認為以他對學校轉手的強烈反應看來，請他留任恐怕不太合適。最後，奧圖爾自己決定離開。

<sup>18</sup> 聖言會檔案：美國芝加哥聖言會會省的省會長赫格柏爾神父（Fr. Hagspiel）於1933年6月3日致葛林德神父信函。信中所載，芝加哥大主教樞機蒙德萊因（Mundelein）表示他沒聽說過輔大在美國約七十萬元的基金。請參見 *Mission to America* (292頁)：1925年，底特律一位富有的捐助人迪奧多·麥瑪納（Theodore MacManus）設立了信託基金，每年可有一萬元孳息供學校動用。在麥瑪納過世後，這筆基金如何處置不得而知。（300頁）：1927年時密爾瓦基天主教婦女傳道協會提供六萬元貸款，加上教廷捐助一萬五千元，準備用予購置恭王府邸。然而這筆交易沒有成，因此這筆七十萬元的基金似乎只是傳言。

<sup>19</sup> 聖言會檔案：“Kurze Zusammenstellung……”（檔案號碼 7023-7024）。1933年4月13

規劃在下學年初也就是在八月一日才開始辦交接，但為求務實，在六月二十日畢業典禮後不到兩個月內即開始著手。

### 聖言會 (SVD)

聖言會建立於一八七五年，會士約三千名，相較於本篤會，聖言會是個相當年輕的修會；聖言會以到未聞福音之處宣揚天主教為宗旨，十分活躍，而本篤會則屬於默觀修會。聖言會是屬於一個非常中央集權的團體，可以將所有會士帶領到任務所需之處；相對的，本篤會的團體比較分散，每個會院各自獨立而他們的會士幾乎終生只處在一地不會遷移。聖言會是個國際性的團體，並有著強烈的德國傳統。梵蒂岡希望輔大能繼續維持美國傳統，但是以美國聖言會這樣一個新會省，實在無法獨力經營像輔仁大學這樣規模的機構。因此，接辦之初大部分的新教員都是德國人及非美國籍者，只有校務長和少數幾人才是美國聖言會的會士。早在一八八二年聖言會就開始在中國——特別是集中在山東南部——展開傳道工作，因此在中國已有約一百七十名傳教士。而他們其中有些是具學術背景的專業人士，甚至還包括一名漢學家，他們都會講中國話而且可隨時接受召喚來服務。四名美國籍傳教士立即由河南南部的信陽（該處為美國聖言會傳教的地區）轉調至輔仁大學服務。

### 為何屬意聖言會？

當本篤會已無力再繼續於輔大辦學時，梵蒂岡求助於聖言會接手，即使聖言會不像道明會或是耶穌會這些歷史悠久、規模較大的修會那樣有辦學的傳統。促成聖言會雀屏中選的因素如下：聖文森的柯區總院長在還負責輔大時曾向聖言會建言，而且也可能曾向教廷方面提出建議；加上教宗碧岳十一世與隸屬聖言會的施密特神父<sup>20</sup>的私交，教宗相當欣賞他將宗教研究與傳道結合。在傳信部關於北京輔仁大學要交由聖言會接辦的訊息中，提到幾個關於為何選定聖言會接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聖言會在傳道工作中展現了活力及效率，因此也應該有能力克服現有的困境，成功經營這所艱辛締造的大學；再者，聖言會的美國會省正蓬勃發展，當時約

日的答應接辦聲明以及九項條件請見編號 7046-7049 之檔案。交接信函則見編號 7052-7054 之檔案。本篤會於 5 月 16 日收到傳信部的正式書面通知。

<sup>20</sup> 施密特神父 (Fr.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是聖言會成員，也是維也納著名的人類學家，研究主題包括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他的重要著作為《上帝觀念之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God* )。



有二百名成員；聖言會在中國也有一些傳教區表現良好；聖言會的成員裡有好些是博學的漢學家及學者等等。<sup>21</sup>另一個原因則很可能是由於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的緣故。駐歐洲的教廷大使或代表一般而言不會介入當地教會的事務；不同於他們，在中國，宗座駐華代表從學校開辦之初已相當投入。投入程度之深，好像學校的最高決策者不是本篤會的總院長、和教廷委派的駐校監督、或當地本篤會的會長，而是他。宗座駐華代表可說是學校轉讓的締造者。<sup>22</sup>中國主教的公教教育聯合會裡有位秘書長。這位苗德秀神父（Fr. Theodore Mittler, 1887-1956）<sup>23</sup>屬於聖言會一員，他是位相當能幹的人，而且觀察力相當敏銳。<sup>24</sup>他曾寫道：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期間，我與宗座駐華代表多次談話時，他曾透露出對本篤會極度的不悅，這種憤怒是我以往未曾見過的。當時代表曾提到由耶穌會或聖言會接辦輔大。我（對聖言會美國省的能力）有些懷疑，因為無法對美國會省有所評論。不過後來我聽說在一月時有兩封信送到羅馬，而且正是因為這兩封信才做了（學校轉移）決定。<sup>25</sup>

雖然苗德秀似乎沒有直接涉入學校交由聖言會接辦一事，不過他身為聖言會一員並且常與宗座駐華代表接洽，而透過他宗座駐華代表對聖言會相當了解是不爭的事實。宗座駐華代表有可能因他而注意到聖言會。能確定的是，在對於選擇接辦輔大的對象上，剛恆毅總主教的意見是很有分量的。

### 移轉給聖言會

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羅馬的聖言會總會才第一次秘密地向山東

<sup>21</sup> 參考資料：厄尼斯特·布蘭德威（Ernest Brandewie）所著之《聖言會北美會省》（*In the Light of the Word.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of North America*. Maryknoll, New York 2000）266-267 頁。

<sup>22</sup> 直到剛恆毅抵達羅馬，與聖言會的契約措辭才得以定稿（見上文）。此外，就轉移一事，傳信部授命宗座駐華代表全權處理。

<sup>23</sup> 苗德秀（Fr. Theodore Mittler SVD），德國籍，在 1903 年加入聖言會，並於 1913 年來到山東。在 1932 年到 1936 年間，他擔任中國主教的「公教教育聯合會」的秘書長。於 1936 年出任輔仁大學的教務長。1937 年至 49 年間，他在山東教授傳教士們中文。

<sup>24</sup> 因為苗德秀神父和宗座駐華代表之間的關係，所以奧圖爾校務長認定是苗德秀造成由聖言會接辦輔大，而因此對他相當生氣。但是苗德秀寫給葛林德總會長的信中指出，他是到四月時才知道學校轉移的決定，而且他還說他對聖言會在中國的領袖們到那時才只被告知而從未被徵詢意見一事非常不滿。見 1933 年 6 月 24 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信函。

<sup>25</sup> 聖言會檔案：1933 年 6 月 34 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信函。

兗州府宗座代牧韓寧鎬主教提及可能會接辦學校一事。四月二十九日美國聖言會芝加哥會省的省會長赫格柏爾神父收到一封電報，內容是：「教宗將北京天主教大學指派給我們。本會〔名義上〕代表美國會省接下，以維持表面的延續。目前先別聲張。」<sup>26</sup>雖然四月十八日時，在北京這件事已是眾所皆知了，不過聖言會山東區會長舒德祿神父<sup>27</sup>直到五月七日才收到電報告知他：「教宗將本篤會手中的輔仁大學轉〔給了〕聖言會。從下個學期開始。將來在輔大的修會團體就交給你負責。傳信部要求給一個未來的教授〔代表聖言會〕協助 Antoniutti（安東紐蒂）。<sup>28</sup>本篤會已準備交接。因此陪鮑潤生〔去〕北平。把他安置在苗德秀之下。凡與學校相關事宜皆需苗德秀的同意。苗德秀推薦〔的〕教授都留下來。儘量不要改變。」（五月六日，羅馬）<sup>29</sup>傳信部在五月十六日時發信給柯區總院長，告訴他因為財務狀況岌岌可危，教廷面臨關閉學校或是另尋機構或修會接手的兩難。在此同時，聖言會的美國會省被委付以接辦輔仁大學的重責大任。<sup>30</sup>四月中時，學校交接一事在北京已傳開了。五月二十日時，聖言會總會長已寫信給陳垣校長<sup>31</sup>及英千里秘書長，<sup>32</sup>告知他們聖言會已同意於新學年開始接

<sup>2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5月11日，聖言會總會長致赫格柏爾神父函。

<sup>27</sup> 舒德祿神父（Fr. Theodor Schu SVD, 1892-1965）在德國出生，於1906年加入聖言會，並在1921來到山東。在1933年他成為聖言會山東區會長。1937年至49年期間，他擔任兗州府主教。1952年時，他到了菲律賓；1955年返回德國。

<sup>28</sup> Ildebrando Antoniutti（安東紐蒂或安童業，1898-1974）是宗座駐華代表於1924至1934年間的秘書。

<sup>29</sup> 聖言會檔案：電報（檔案編號 7059）。在當時苗德秀神父是唯一一位知道北京及輔大狀況的聖言會士。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很尊重也很信任他。漢學學者鮑潤生神父是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中最適合派去學校的人選，不過鮑潤生曾和上司們有過一些問題。所以才賦予苗德秀神父比鮑潤生高的權力。參見：P. Miroslav Kollár, SVD, 發表於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台北，2003年9月26-27日，頁14-16）論文集中之〈鮑潤生（F. X. Biallas, 1878-1936）為《華裔學志》期刊的創立者—他的生活與事業〉。宗座駐華代表對苗德秀神父在中國主教的委員會的工作表現相當賞識，但卻不希望讓他直接負責學校交接一事。這可能是因為苗德秀神父很敏銳、說話又坦率直接，所以不太會與中國人打交道。再加上奧圖爾把學校轉移給聖言會歸咎於苗德秀。所以才讓舒德祿神父和鮑潤生神父來辦理學校交接，而苗德秀只能私下給予協助。請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舒德祿致葛林德函。

<sup>30</sup> 聖言會檔案：柯區總院長信件之副本。來自聖文森會院及學院檔案室。檔案編號 1673-33。

<sup>31</sup> 陳垣（1880-1971），字援庵，號圓庵，廣東新會石頭鄉人，著名歷史學家，特別研究個各宗教在中國的歷史；前中國教育部次長（1921），北大和師大的導師，前北京圖書館主任，1925年在輔仁社教書，1926年1月26日為社長；1927年輔仁大學副校長和中國文學系系主任，1929年6月任命為輔仁大學校長，1931/2為了整理個人著作，休假一年，由沈兼士董事代理校長職務，1935年當選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9年教宗碧岳十一世授「聖額我略加徽騎都尉」（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St. Gregory the Great with Badge），1948年3月校董胡適，校長陳垣，文學院院長余嘉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

辦學校。聖言會

接受這個重責大任，唯一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這個學術機構能復興中華民族自遠古累積至今深厚豐富的文化，而這也是聖父（教宗）在他給我們的信中所諭示的想法。如同我們向聖父回信所言，這是我們該努力以赴的。當學校交給我們之後，我們會以此為目標帶領學校，期望最終能將其交付予中國教徒中的有識之士，讓輔大成為完全的中國學校。

葛林德總會長也強調將會盡量不做改變以維持學校現況，希望到時候所有的教授們能留任，並繼續為輔大服務。<sup>33</sup>

### 接管輔仁的最後準備

聖言會山東區會長 Fr. Th. Schu（舒德祿神父）和在上海的 Fr. F. X. Biallas（鮑潤生神父）<sup>34</sup>於五月三十一日到達北京，並由 Msgr. Antoniutti（安東紐蒂蒙席）代為接待。安東紐蒂蒙席在當時也代表宗座駐華代表處理校務交接事宜。舒德祿神父和鮑潤生神父想知道他人如何看待聖言會接收輔大一事。他們聽說，因為聖言會是一個真正的傳道團體，而且傑出的傳教方式極受推崇，所以雖然法國遣使會士希望事情發展不是如此，但還

---

士；1950年10月10日教育部接辦私立輔仁大學而後任命陳垣為校長；1952年9月陳垣被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包括併入的大部分本來輔仁大學的學系）的新校長。曾出版很多歷史和教學書籍，像《勵耘書屋鈔本名理探》。

<sup>32</sup> 英千里先生 Ignatius Ying-Ki(1900-1969)，北平市人英斂之的兒子，天主教徒，1911-1913年南開中學，1913到外國（荷蘭，比利時，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學法文、英文），1918年畢業在牛津大學，繼續進修政治和經濟學在倫敦，1920-1924年在愛爾蘭教漢語，1924年做輔大註冊主任和在輔仁社做秘書，同時是香山女子中學校長。教英國文學，跟奧圖爾神父合著並且出版論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的雙語教科書，1927-1946年任輔仁大學秘書長；1933-1946年西方語言學系主任；1939年教宗碧岳十一世誥授他「聖額我略騎都尉」（Commander in the Order of St. Gregory the Great），1944年3月11日被日本軍隊逮捕，以後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入獄，1945年7月15日出獄；1945年出任北平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以後被調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1948年冬以輔仁大學當局堅邀回校，遂辭去教育部職務，1949年到台灣由台灣大學聘為英文系系主任，1960年應聘為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校董兼任副校長，1964年因病而辭去副校長職，1969年10月8日以肺疾而死。

<sup>33</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5月20日，葛林德致陳垣及英千里函（檔案編號 7086-89）。

<sup>34</sup> 鮑潤生神父，社經學系系主任兼社會學組組長鮑潤生神父（Francis Xaver Biallas SVD, 1878-1936），德籍聖言會士，1918年獲得萊比錫大學的漢學博士學位，1922到山東傳教，1926到上海做研究工作，1933年到北京為聖言會負責從本篤會手中接管輔仁大學，1935年把《輔仁英文學誌》改變更具有學術性的《華裔學誌》，1933-1936年社會經濟系主任和社會組組長，1936年5月28日去世

算是滿意於目前的安排。而且據了解人們期待學校能有更好的改變，因為在本篤會的領導下，在輔大服務的神職人員缺乏紀律——本篤會會士內因對立而分裂，他們還接受了在別處有不良紀錄的神職人員。<sup>35</sup>

當舒神父和鮑潤生抵達當日，安東紐蒂蒙席希望他們能住在學校內，高福德監督拒絕了。而當安東紐蒂蒙席堅持時，高福德神父利用秘書長英千里先生說是陳垣校長不願意他們兩位住在學校。看來高福德神父和前任院長伊德風神父不合，而若讓舒神父和鮑潤生和本篤會會士一同住在學校，他們可能會聽到另一方的說法。所以最後他們只得借住代表處直到六月二十日交接當天。之後安東紐蒂蒙席帶他們與相當幫忙的本篤會會士同住。<sup>36</sup>

六月初時，舒德祿和鮑潤生已和學校內主要的中國籍教授們——陳垣校長、英千里秘書長、兩位院長及兩位系主任——有了愉快的長談。但是，在這些教授的書面備忘錄上仍顯示出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記錄的最後一部份是這麼記載的：

羅馬教廷會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將北京天主教大學由本篤會手中交給聖言會，據我們了解是因為本篤會拒絕明確承諾支持學校。然而，新的管理者是個年輕又陌生的團體，中國的教育界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因此，新來的神父們要從教員和學生們方面得到他們應有的尊重、認同及信心，還有許多要努力的。到目前為止，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聖言會仍是個未知數，因此很自然地，這裡的人會對聖言會言抱持疑慮及不安。「他們會如何對待中國教職員？」「他們除了是有學識的人外，有沒有實際的教學經驗？」「他們能補救過去缺失，而且完成應有的改革嗎？」上述這些、還有其他類似的問題，都是和輔大有聯繫或是關心輔大的人們一再提出的疑問。

因此，我們堅信，若要學校成功的延續，聖言會的神父們必須全心贊同輔大的理想和宗旨，盡他們全力贏取全校師生的喜愛及信心，還要準備充裕的資金以補救以往的不足，並且為學校提供專業幹練的師資及行政人員。<sup>37</sup>

<sup>35</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舒德祿致葛林德函。

<sup>3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2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函。

<sup>37</sup> 陳垣校長及英千里秘書長於1933年6月4日寫了一份備忘錄給聖言會的神父們。最後一部份收錄於聖言會檔案資料中（檔案編號 7099）。宗座駐華欽使的代表安東紐蒂蒙席針對這份備忘錄及6月10日對教職員安排的要求寫了一封慰勉的信，他說在學期末前校長和他的行政團隊負責明年人事任用，校長書面所提的安排在學期末會處理。請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13日安東紐蒂致陳垣函（檔案編號 7100-7101）。

除了這份文件外也列了學校新學年所需安排的完整清單，一併交給了聖言會。

## 交接方式

雖然聖言會與教廷傳信部約定從新學年，也就是八月一日起，才正式開始接手學校事務，而且到那時聖言會才需開始負擔財務支出；<sup>38</sup>但本篤會會想在六月十九日畢業典禮一結束立刻離開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在學期末即需要為下學年的事務做準備，因此交接事務在畢業典禮後便提早展開。在這個莊嚴的場合，安東紐蒂蒙席向教授及來賓們介紹三位聖言會神父。陳垣校長在致詞時提到教廷對輔大的發展所表現的關懷，感謝即將離開的本篤會修士們，也特別提到對奧圖爾神父的謝意。隔日，也就是六月二十日，駐校監督 Fr. Francis Clougherty（高福德神父）和會計主任 Fr. Hugh Wilt OSB（韋休神父）<sup>39</sup>將在賓夕法尼亞州西摩蘭郡本篤會名下的財產契據、證書以及在美國使館登記的產權文件（包括濤貝勒府等土地、校園主樓對面的附中宿舍、體育場、還有體育場南側的地產）一併交給宗座駐華代表使團的稽核員安東紐蒂蒙席。同一天，安東紐蒂蒙席便在鮑潤生神父（代理的校方代表）的監交下將這些文件轉給了聖言會的代表舒德祿神父及 Fr. Cremers（商樹勛神父）<sup>40</sup>（新任的會計主任）。在交給聖言會的文件中也提到上述算是教廷財產，也繼續屬於教廷所有，現下只是暫時交由聖言會。聖言會的使用權需符合當初天主教大學設立所奉行的教育目標及宗旨，對於學校動產的處理權也是同樣的道理。<sup>41</sup>安東紐蒂蒙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學校的產權者是聖文森會院，但聖文森會院從未賦予這些本篤會會士們代為處理產權的權利。<sup>42</sup>因此，交接時沒有任何文件提到學校的債務，交出的只有學校的地契、產權等文件。交接時，高福德神父是以學校的監督身分（他簽署文件時甚至沒有註明本篤會會士身份），而韋休是以

<sup>38</sup> 日程改變已為聖言會派來的管理人鮑潤生神父接受。（鮑潤生致葛林德函，1933年7月14日）到7月31日該學年底前的支出都由傳信部負責（1933年6月20日安東紐蒂報告，檔案編號7132-37）。這筆款項據計約為二十二萬六千墨西哥銀元。

<sup>39</sup> 韋休神父（Hugh Wilt OSB, 1904- ），美籍本篤會士，1929年訓育職員，1930年事物長秘書兼齋務員（1931），1933年離校。

<sup>40</sup> 會計主任：商樹勛神父（Fr. William Cremers SVD, 1901-1985）會計部主任，德籍聖言會士，1935-1943年會計課主任（會計課課長），1948年到美國讀圖書館學，1950年到菲律賓宿霧市（Cebu City）聖卡羅斯（San Carlos）大學教書，1985年在菲律賓去世。

<sup>41</sup> 聖言會檔案：這份簽好的文件歸檔在編號7103-5及7138-9檔案中。聖言會檔案：美國使館登記有案的契據及證書的副本。（無檔案編號）

<sup>42</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0日，安東紐蒂報告，（檔案編號7132-37）。

學校會計主任的身分，他們都不是代表本篤會。所有權似乎從沒有轉移給教廷或是給聖言會，所以在法律上仍存有問題。<sup>43</sup>

本篤會的北京修會院長 Fr. Basil Stegmann（貝索·史泰門神父）在畢業典禮後立即解散修會團體，他本人也在隔日離開。<sup>44</sup>鮑潤生神父記述：

就史泰門的立場來說這是可理解的，因為這狀況並不好受，但對於其他還留著的、尤其是並沒有旅費<sup>45</sup>只能晚後再走的本篤會士們來說，這樣做很不好，而對我們而言也很麻煩。前院長伊德風神父沒有權利，而負責人又沒能留到最後，像是付清前債、財產造冊、辭退雇員等很多事的安排便無法順利處理。<sup>46</sup>

在七月交接中，爆發了第一個大問題，也就是政府宣布要介入調查。一連串的不實指控，伴稱輔大很不穩定面臨倒閉，可能撐不過一年。所幸最後該調查並未達到某些對輔大不友善的有心人士所預期的效果。<sup>47</sup>

### 聖言會之接辦

聖言會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則是為本篤會離開後所空缺的校務長及系主任等重要職位尋找接手的人選。於六月二十五日召開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要求共十五位聖言會教授們擔任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哲學、社經系等系的系主任，以及英文、歷史等系的教

<sup>43</sup> 所有權仍在本篤會名下。後來當聖言會要以學校名義借款時，便無法以學校財產來抵押。1934年2月24日葛林德神父正式要求教廷傳信部來釐清這件事(檔案編號7167)。但傳信部沒有處理。

<sup>44</sup> 史泰門神父返家時，聖言會特別注意在他途經的每一處都以禮相待，例如當他經過山東兗州府或上海時，都派人熱情的接待。史泰門神父在上海時住在聖言會好幾天。史泰門神父不屬於聖文森會院，他是由明尼蘇達州聖若望會院借調來的。

<sup>45</sup> 特別是來自聖文森會院的七位本篤會會士尚未收到來自柯區總院長關於他們未來動向的任何指示或是錢。柯區似乎是遲遲下不了決定，或可能在等駐華代表伸出援手為會士們付旅費。伊德風神父和高福德神父留在中國，並在開封成立了一所修道院。

<sup>4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7月14日，鮑潤生致函葛林德(檔案編號7141-43)。他也提到在中國人所辦的告別餐會上，若奧圖爾和高福德這些人對與學校交接相關人士的評論能謹慎發言的話就好了。聖言會的人已儘量對於他們的評論不予理會。不過前任的北京本篤會修院院長伊德風神父就相當友好而且十分合作。

<sup>47</sup> 聖言會檔案：穆爾非(Joseph P. Murphy, SVD)所著《聖言會在中國首都》(*The SVD in the Capital of China*) (檔案編號7161-65)。參考資料：Karl Josef Rivinius SVD, *Die Katholisch Fu-Jen Universitaet in Peking und ihre Uebernahme durch die 'Gesellschaft des Goettlichen Wortes' im Jahr 1933*, in *Verbum* 21 (1980), pp. 206-228, p. 222-223。該書中引用1933年10月2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Trautmann)所言，外力介入欲影響學校政權，使中籍校長下台。不過政府調查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授。<sup>48</sup>他們應該立刻上任，因為新學年的課程規劃及教員聘請等工作刻不容緩，需要在七月份時定案，另外還需要準備七、八月份間入學考試試務。其餘尚有許多關於中國籍及外籍人事異動需要處理，因為有些奇怪的狀況不容繼續忽視。幸好，陳垣校長與新任管理人鮑潤生神父合作愉快，因此這些事得以妥善安排。

新任校務長 Fr. Joseph Murphy (穆爾菲神父)<sup>49</sup>是位美國籍神父，在羅馬取得教理神學的博士學位，原任教於聖言會在密西西比州聖路易斯灣的神學院；在六月二十二日交接後，他立即獲得任命，但直到九月九日才抵達北京，在九月十八日學校開學。在第一年，聖言會只能提供九位神職人員為學校服務，這九位包括——鮑潤生神父，德籍漢學家，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系代理系主任；校務長穆爾菲神父，教授哲學並兼任心理學系的代理系主任；德籍的 Fr. Stephan Richarz (李嘉士神父)，原在美國教授地質學，在輔大教化學和物理，並擔任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系主任；張守忠神父是甘肅人，自羅馬取得教理神學的學位，來輔大教哲學並擔任系主任，還兼訓育課主任；Fr. Rushman (羅詩曼神父)及 Fr. Henkels (韓克禮神父)兩位原在河南傳道的美籍傳教士被安排教英文；奧地利籍的 Br. Berchmans (白立爾修士)原在山東傳教，被指派教德文及藝術；原在山東教區的德籍神父 Fr. Sonderkamp (宋德剛)擔任中學校務長；從菲律賓調來的美籍 Fr. Edwards (艾德華神父)有英國文學學位，所以教授英國文學，並擔任體育課主任；原在河南教區的美籍神父商樹勳及其他來自山東的四位聖言會的德籍修士則負責行政工作。算起來總共有四位美籍和四位德籍神父，一位中國籍神父，和四位德國籍修士。另外，還有一位相當幹練的加拿大籍平信徒 Mr. Edge (艾治先生)，他與穆爾菲神父一同抵達，擔任事務長襄助穆爾菲神父處理校務。不過，一年不到就有一位神父及兩位修士不適應輔大的工作。直到一九三四—三五學年度聖言會教授們才夠達到最低員額。然而，在接管後第一學年度即將結束時就有三位重

<sup>48</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5日，1933-1934學年度首次校務會議之紀實，第11頁。(無檔案編號)

<sup>49</sup> 參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赫格柏爾致葛林德信函(檔案編號7110)：聖言會美國會省總會認為穆爾菲神父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去中國，大家都知道他體弱多病。另一封於6月9日的信件指出，醫生判定穆爾菲神父心臟有些問題，體能也比一般人差，但是這些都不是太危險的問題。省會會長表示他會比較希望由 Fr. Stephan Richarz (李嘉士神父)來擔任校務長，因為他的校務經驗比較豐富，而且對科學的學養很高。「不過，既然你明白指出校務長一定要是美國人，那麼除了穆爾菲神父外已別無人選了」(檔案編號7112)。德籍的李嘉士神父 (Stephan Richarz SVD, 1874-1934) 是知名的地質學家，在美國任教。穆爾菲神父 (Joseph Murphy, S.V.D., 1895-1935)，美籍聖言會士，1930年在羅馬獲得神學博士學位，1930-1933年在美國南部聖言會神哲學院教書。1933年7月4日由葛林德聖言會總會會長任命為校務長，1935年9月5日因心臟病去世

要的教授突然辭世。他們是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與物理系主任的李嘉士神父，<sup>50</sup>協助研制斑疹傷寒預防疫苗的醫學博士及微生物實驗室主任 Dr. Gajdos（蓋道世醫生），<sup>51</sup>以及曾為輔仁奔走爭取正式認可、獲得立案的教務長劉復（劉半農）<sup>52</sup>教授。

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間，中國籍人士共有八十四名在輔仁大學、四十五名在附屬中學部任教。包括聖言會會士、中、外籍教授（7）、及職員們在內全體共有一百五十九名教職員。學生人數如下：大學部五百九十一人，中學部三百五十七人。女子高中部有六名外籍、八名中籍教師、及四十七名學生。全體學生中有約二百人是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四年約有七十七名畢業生，其中包括了首屆由理學院及教育學院畢業的學生。輔大的校董胡適博士應邀於畢業典禮致詞。

當時有感輔大畢業生對高等教育仍有不足，故決定在新學年度時籌設研究院。配合設立的是大學翻譯出版部。然而，一年後因為師資及招生人數皆不足下，決議放棄開設研究院的計劃，直到一九三八年研究所才正式開辦招生。然而大學出版部仍照原定計劃設立。

除了人事安排外，第二項急需處理的事務乃是建造學生宿舍。政府單位和師生們皆殷切期盼能有一樓新建的宿舍樓。若能在第一學期蓋好宿舍，將會大力增進大家對聖言會的信心及接受度，也能避免學生們的不安。<sup>53</sup>當時六百名的大學生中半數以上都不是北京本地人。教學主樓可安置約八十名學生，另外其他租用的樓舍也可收容約一百名。但大多數外地學生還是只能散居北京的民居，處境常常很差。這對學生的管理及紀律有相當不良的影響，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也為學生們的健康著想，蓋宿舍有其必要性。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以二萬元等值黃金的費用，蓋了可容納約二百人的宿舍樓。該宿舍樓位於體育場南側，穆爾菲病故後命名為穆爾菲樓。

<sup>50</sup> 李嘉士神父（Stephan Richarz SVD, 1874-1934），德籍聖言會士，獲得維也納和慕尼黑大學地質學、礦石學、地理學博士學位，以後有豐富學術成果，1921-1933 年在美國聖言會任教，1933-1934 年到輔仁大學任理學院院長兼化學教授，1934 年 7 月 13 日在山東做野外調查工作時中暑去世

<sup>51</sup> 蓋道世（Stephen Gajdos），匈牙利國籍，布達佩思大學醫學博士，被 Fr. Josef Rutten CICM（呂登岸神父）邀請來輔大發展預防注射疫苗預防斑疹傷寒症，1931 年到 輔大，1934 年離開但由於腸子的腫瘤而在非洲突尼斯去世。

<sup>52</sup> 劉復（半農）（1891-1934），江蘇人，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新詩人、雜文家和著名的語言學家，1924-1926 年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北大語音學教授，1927 年在輔大任教，1929-1931 教務長和建立教學制度聘任一流的學者來輔仁教書，1929 年為輔仁大學辦理登記和政府立案工作，1934 年 7 月 14 日因在內蒙古作語音學的田野研究時所發生的病而在北京去世。

<sup>53</sup> 出處同上，鮑潤生致葛林德函。



負責女子中學的六位本篤會修女獨立工作，故沒有隨著本篤會修士們離開。她們曾花一年修習中文，所以足以應付留在當地。然而她們在美國的上司無力募款維持她們在中國的所需經費，所以希望能把她們召回美國。女子中學才開辦不久，所以最後她們承諾再留兩年，到三年一屆的學生畢業。一九三五年時，她們離開北京到開封服務，修女們開設了一間醫務所，並協同高福德神父在當地中學講授教理。

財務問題仍舊是最大的隱憂。在當時學校的經常性支出大約是七萬五千元等值黃金。一九四八年時，擔任校務長的芮歌尼神父曾記載道：「根據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答應接辦輔仁並與教廷傳信部所立的契約，聖言會只承諾負責學校三分之一的管理費用，另三分之一則由學費支應，餘下三分之一則由傳信部的補助金支應。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聖言會所付出的已超過三分之一的額度。要是我們所付出的剛好只打平學費收入的話，學校絕無法繼續支持到今天。」<sup>54</sup>然而，這些年來不管美金如何貶值，傳信部的補助金還是沒有調高，仍舊維持在二萬五千元等值黃金。舉例來說，傳信部的二萬五千元黃金在該年初（一九三三年）可換到十二萬五千元墨西哥銀元（當時可在中國流通的貨幣），但在年底錢匯到時，換算後只剩八萬元墨西哥銀元的價值了。此外，因為聖言會經驗尚且不足，所以在參考前學年的預算以及考量不同學系的要求下，首次通過的預算額度頗高。由於是學校核准的預算，所以各系覺得他們有權把錢花光，即使校務長極力希望他們能盡量節省。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的預算是三十六萬八千九百元，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人事費、百分之十五是儀器設備、百分之八是圖書經費、百分之二十一為修繕費，此外還有百分之六額外費用。在北京的五所主要大學中，輔大的預算是最低的。教授們的月俸約為二百二十元到三百元間，和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平均月薪相比，已經少了一百元。即便如此，每月發薪餉的資金仍常常不足。由於國家社會黨對匯款的限制，所以德國方面的資金難以送往中國，而美國的基金募款單位在頭幾年的募款成果有限。因此，校務長必須多方借貸，特別是向聖言會上海總務處募集。勞心勞力下，穆爾菲最後於一九三五年九月病逝。

## 結 論

當年突然被交付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對聖言會這個年輕的修會而言是個相當大的挑戰。儘管聖言會在會士們的培訓一直很注重學術，也

<sup>54</sup> 聖言會檔案（1948年檔案），芮歌尼神父（Fr. Rigney）1948年報告之附錄。然而，本人卻未在聖言會檔案資料室中找到這份詳細的約定書。

在大學培養學術人才，他們對於人類學也很擅長並用於傳教工作方面。不過在現有的神學院外，他們沒有設立任何學術機構或大學，也只有少數幾個有名的學者院士。因此聖言會很難從內部組成一個專業師資團隊來接管學校。

本篤會失敗殷鑑不遠，聖言會仔細檢討後並從中學習經驗、記取教訓。本篤會的財務方面處理不善，是因為他們從未齊心協力的來支持這個辦學工作，各會院間如此，甚至連聖文森會院自己內部的修士們也是如此。在當時嚴峻的經濟情勢下，承辦學校的聖文森會院的規模及能力根本不足以應付。聖言會無論是人事或是資金都是由中央統一管理，只要是總會的決議，轄下的會院皆全力支持。不過，就接辦輔大一事，許多在中國鄉間的聖言會傳教士並不贊同，因為他們認為對中國知識份子傳教不會有結果，中國的救贖不會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不是由有識之士發起，而是會由廣大的天主教信眾展開。<sup>55</sup>此外，聖言會在美國設立了極有效率的募款機制，<sup>56</sup>在學校的預算花用也十分節省。所幸當時已有了一棟大的教學主樓，所以得以避免像本篤會那樣必須挹注大量的建設資金。話雖如此，在接辦初期和後期，所面對的財務問題仍舊與本篤會所面臨的相差不大，如同本篤會的司泰來總院長，聖言會的穆爾菲神父也因為財務壓力在一九三五年過世。

本篤會組織的另一弱點在於領導權分散，司泰來總院長逝世後情況更為嚴重，這問題可從三方面來談。第一，北京修會有一個院長擔任團體上司，而學校內又有教廷派任的駐校監督，兩者的權限及管轄範圍從未明確劃分。理論上，學校是由聖文森總院長全權負責，而院長身為他在北京修會的代表，應有權管理人事及財務。但是監督和校務長對於人事安排和經費支出卻總是自作主張。兩方勢力無法合作下，便造成了彼此的摩擦爭執和金錢浪費。因此，聖言會決定校務長和當地修會的領導要是同一人擔任，而監督由葛林德神父、也就是聖言會總會長來擔任，<sup>57</sup>他人在羅馬搖控、督導與負責，是最後的把關者。

其次，領導權的問題還包括宗座駐華代表的強力介入，這使得校內勢力整合更加困難。宗座駐華代表對各項事務都有意見；若有人不滿，便會去找宗座駐華代表抱怨。剛恆毅總主教對如何在中國傳教，特別是傳教本

<sup>55</sup> 參見 Bornemann(包敏)著: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Analecta SVD-59) Rome 1982, 第 233-4 頁。

<sup>56</sup> 泰肯神父 (Fr. Ralph Thyken SVD) 在芝加哥設立一個為在北京的公教大學募款辦公室，在創立後幾年即有了足夠支應學校支出的經費。

<sup>57</sup> Nuntius SVD, Vol. II, Fasciculus 1 (1934), No. 54, p. 58-9. 由羅馬於 1933 年 8 月 5 日任命。

地化的議題總是相當有主見，所以，他因病請辭無法續任駐華代表對學校可算是好事。當蔡寧<sup>58</sup>在一九三三年底接任駐華宗座代表時，校方得以與代表團建立新合作關係，因此，聖言會在接辦學校後也可少了些外力干預。

第三，北京的本篤會會院內大部份修士是來自於聖文森總會院，也有另一群由其他本篤會會院來的會士，還加上像奧圖爾神父這樣的教區神父。不同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習慣，再加上散居校區、沒有共同生活的會院，因而無法過團體生活維持共同的修道作息及禱告。也因此對於神職人員的紀律問題有諸多抱怨，也對在北京的天主教會的形象有所損傷。聖言會對於這一點也有預防措施，只有持身嚴謹、無不良紀錄的會士才有資格被派到北京。因此，雖然聖言會的成員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籍，行事卻能十分團結。

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以及德國國家社會黨開始一個反對教會的運動而對匯款設限之際，由聖言會接辦北平的天主教大學之舉是相當冒險的。而校內的教職員對於由這個德籍而非美籍的團體來接辦也有極大的疑慮，畢竟這個團體與本篤會、耶穌會或遣使會相比之下非但經驗不足而且又寂寂無名。在聖言會總會接受任命的背後是相當複雜的心情。他們懷抱著對教宗的順從，對於自己是資淺團體卻被選中擔負大任而相當自豪，身為傳教會能展開偉大傳教任務當然是躍躍欲試，但同時對於人事、財務等負擔也心懷畏懼。不過，事實上聖言會的接辦可說是相當平順，除了一些小問題，對原有的人事只新增聖言會來的教員外沒有太大的異動，和即將去職的本篤會會士們的交接氣氛相當和睦。

（輔仁大學英文研究所 李桂芬譯）

<sup>58</sup> 蔡寧總主教(Archbishop Mario Zanin, 1890-1958)於1933-1946年間為教廷駐北京專使。

## Attachments

**I.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SVD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These were proposed by the SVD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opaganda Fide and then accepted by the latter on April 27, 1933 under Prot: N. 1303/33.

April 13, 1933

Most Reverend Eminence,

In filial obedience to the desire of the Holy Father which was communicated to us by Your Excellence and eager to serve the Holy Church, in so far and in which ways this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ce of the Lord will be possible,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declares itself willing to accep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order to fully clarify the matter and to settle uncertain aspects of the future work, we think it opportune to specify the contract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accepts in name of its North-American Provi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possi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it will call members of that Provi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at least in outward appearance,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esent work.
2. The University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ety with a public notification of assignment in which the faithful and the ecclesial authorities of America also are invited to support the undertaking as a Pontifical Work.
3. The effective assumption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side of the Society will take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1933-1934. The transfer will be done directly from the Benedictine Fathers to the Holy See or the Apostolic Delegate, and then from there to the Society. On that occasion also the existing property rights of the Benedictine Fathers must be clarified and regulated. From our side permit us to respectfully recommend that the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will rema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Holy See and that we only get its use for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Holy See entrusts

- the governance to us. In this way during a time of disorder the property will be more secure than when it belongs to one single religious congregation.
4. The Society considers it but natural that the contracts and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authority be kept unchanged. Also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ersonnel it should in the beginning be kept as much as possible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 in order that the changes show themselves to be as little as possible. Furthermore, we are prepared to continue the employment of the present teachers, in so far as they are able and prove themselves. In particular, we are happy if Professor O'Toole would continue 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r in any case would cooperate within the University.
  5. In a particular way the Society would wish that the Women's Section which at the moment exists and is directed by the Benedictine Sisters be kept in its present teaching capac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Thus it is our desire that the Benedictine Sisters continue their present activity. However, if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they want to give it up, the Society will then make an appeal to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Spirit in order to found a similar institute.
  6. The Society shall conside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as a missionary work. Therefo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struction and the desire of the Holy Father, it will be from the beginning its aspiration and care to prepare and to set in motion, through opportune choices and education of additional indigenous personnel, that mission in such a way that when circumstances in the future permit, the University be operated by Chinese priests and lay people, so that it will become a fully Chinese institution.
  7. The Society agrees that the yearly interest of the legacy of Milwaukee, which belongs to the University, will be used as far as necessary to pay back the amount borrowed from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which has effectively been spent f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Society therefore asks His Eminence, if this solution is acceptable, to give the necessary instructions to His Excellence Msgr. Stricht, Archbishop of Milwaukee, who administers in name of the Holy See this legacy, in order that he can hold negotiations with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8. For the payment of the debts so far incurred during the further functioning of the University till the end of academic year in the month of June we can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Expecting a definitive response in order that we can start now already the work for a good result of this great undertaking I pay my highest respect,

To His Eminence Pietro Cardinal Fumasoni-Biondi, Prefect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Fr. Jos. Grendel,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49, p. 52-53.

**附錄一：**聖言會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的**附帶條件**。聖言會在與傳信部協議時提出，後經傳信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接受。書信編號1303/33。原文是義大利文，由作者翻譯成英文。

1933年4月13日

樞機主教閣下，

閣下告知我們聖父的指示，我們願意順從並樂於為教廷服務，並在天主的協助下全力以赴。聖言會在此宣佈願意接掌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

為了明確表達立場，也為未來的工作不確定之處能有所釐清及規範，本會認為應當立約具體訂出下列條件：

9. 聖言會以北美省會之名接下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在能力限度內，特別是初期時，將召喚該省會會員來服務，至少在表面維持校內現況。
10. 教廷將頒布敕命公告輔大交由聖言會這項安排，並在命令中號召美國各界虔誠的教友和教會領袖們共同支持輔大辦學這項宗座事業。
11. 聖言會接收輔仁大學將於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開始正式生效。轉移的工作將由本篤會會士們直接交接給教廷或宗座代表，再由教廷或宗座代表交接給聖言會。交接時，本篤會現有的產權問題要闡明及規範清楚。本會敦請教廷繼續擔任輔仁大學的所有人，聖言會對學校的權利只在教廷將學校付託給我們的期間。在時局動盪之際，學校若只屬於一個修會恐不穩當，唯有在教廷庇護下，學校的財產權比較安全無虞。
12. 聖言會認為校方與當地政府的現行約定及關係自然應保持不變。關於校內組織及人事安排在初期應盡量維持現狀，不做任何大的變動。只要現有教員表現稱職，我們預備全部延聘。特別是，若奧圖爾教授願意，我們希望他能留下繼續擔任哲學系主任，或者無論如何能為學校服務。
13. 本會希望現有由本篤會修女們負責的輔仁女院，能依現狀繼續辦下去。因此，我們期待本篤會修女們能留下服務。若是她們無法繼續，本會將請求聖神婢女會的修女們開辦一個類似的機構。
14. 聖言會會將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視為文化傳教工作。這也是聖父的指示和期望，因此從接手起便會著手致力於達成此目標。希望透過

選擇及培育合宜及勤奮的華籍人員，將來時機成熟時，學校能全由中國籍的神職人員及平信徒來掌管，以成為名實相副的中國機構。

15. 聖言會同意將密爾瓦基贈予輔仁大學的捐款的每年孳息依需要用於償還向紐約花旗銀行借來用於學校的貸款。若此舉可行，本會請求閣下代為向以教廷之名捐款的密爾瓦基總主教史崔區蒙席傳達，以便他和美國花旗銀行協調進行必要的手續。
16. 學校之前至六月底本學期末為止所負債務的清償，聖言會概不負責。

期待您明確的回覆，我們才能著手進行以期良好成果。

獻上最高敬意——

致 皮特羅·夫瑪松尼-白翁迪 (Pietro Fumasoni-Biondi) 樞機，傳信部部長  
若瑟·葛林德神父聖言會總會長 上<sup>1</sup>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I (Anno 1934), Rome 1935, no. 49, p. 52-53.



## **II. The Transfer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the SVD as a Pontifical Work:**

April 29,

1933

Sacred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

Protocol No. 1302/33

Most Reverend Father,

Your Reverence knows how the His Holiness Pope Pius XI watch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and with the most loving interest over the Catholic mission territories spread everywhere in the different continents.

Among all the mission territories the Mission in China occupies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august heart of the Pope. This immense population indeed comprises almost one fourth of the entire mankind, and in this numerous people the Church already enjoys an abundant and promising spiritual flowering.

The noble Chinese nation possesses an old and famous civilization, and since the most remote times it has developed a great and wonderful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culture.

Therefore to gain for the faith not only the souls of the poor and of the simple Chinese farmers, but also the minds of the learned and of the leaders, this is the most fervent aspiration of the Holy Fathe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would be pervaded by the Christian spirit then it would not only be raised and activated, but also would be the most certain guarantee of a radiant Christian future for the entire nation.

These intentions inspir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undertaken a few years back in a fervent and generous spirit by a small group of meritorious persons. The work, strongl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by the Holy See, was blessed by the Lord, and very soon showed a satisfying development. The competence and the name of the college of professors, among which figured famous Chinese men of learning, the sound method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tudents, which numbered over one thousand, were duly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al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recognized the Universi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the other state Universities.

Already ample blessings have been produced for the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by the University, but one can expect much more for the future which seems full of even greater promise, if the zeal and love of the Catholics, and in particular the Catholics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would concern themselves even more fervently with this providential institute and would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ent hour.

To direct and operate successfully such a great and important undertaking, indeed, requires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means.

Now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which You so worthily govern, in particular your flourishing North American Province, show themselves very able to strive after the desired purpose and to overcome obstacles of all kind which hinder the lif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his Society already in its short existence has shown such a vitality and efficient activity for the missions, that it appears capable to undertake successfully the new enterprise. The Institute in fact already has big and important mission territories in China, counts among its members distinctive sinologists and scientists, and enjoys the esteem and sympathy of a great number of Catholic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of Europe and of America.

Therefore, the Holy Father now appeals to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of Your Reverence and of your Confreres that you be willing to take upon yourself with the usual readiness also this new and most important task, which certainly will demand big and long-term efforts, and he is sure that that he will get a broad and generous accepta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from now on will be exclusively e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is Society, which will hold with full authority the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only be depended on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The University itself is of such concern to the Holy See that it rightly be considered a Pontifical Work, and as such it recommends itself to the generosity of all the Catholics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American Catholics, which in the past have shown their lively interest in this enterprise of capital missionary importance.

May the Divine Grace which I invoke ardently, and the most special blessing of the Holy Father guide both the staff and the benefactors of the

University, so that through it new and unexpected progress be made,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and for the conversion of China.

With the all best wishes for Your Reverence and renewing the expression of my deepest respect, I remain

Your Reverence's most dedicated servant

P. Cardinal Fumasoni-Biondi, Pref.

+ Carlo Salotti

Arc. Tit. di Filippi, Secretary

To the Most Reverend Father Joseph Grendel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50, p. 53-55.

## 附錄二：將宗座事業北京輔仁大學轉移給聖言會

1933年4月29日

教廷傳信部

書信編號. 1302/33

會長大人，

如您所知，宗座碧岳十一世對世界各處的傳教區皆非常關注及愛護。

中國的傳教工作在宗座心中佔有特別的位置。中國擁有的廣大人口幾乎是人類總數的四分之一，而在這麼多人中已有許多領受了教會的福傳，教會也見到了大有可為的牧靈園地。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數千年來這個悠遠知名的古國在科學與文學皆有特出的發展。

因此，我們不只要對窮苦及無知的中國農人福傳，也要讓那些知識分子及領導人物信奉天主，這是聖父最殷切的期盼。當我聖教福音能深入中國文化之時，就不僅只是提倡或推行，必將能風行草偃，全國奉行。

因為懷抱著這些目標及理想，在數年前一小群令人敬佩的教徒，他們熱情無私的促成了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設立。教廷強力支持及鼓勵他們的工作。在天主護佑下，很快地就見到令人滿意的進展。學校的教授包括了中國優秀知識份子，整體師資的能力及名聲、紮實的教學法、和已逾千名的學生的良好風紀，在在令中國國民政府相當賞識，也因此給予輔大與其他國立大學相同的認可。

輔大在福傳及教化已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但是可能的成就應不止於此。若天主教徒們——特別是美國及中國的教徒們，能持續他們的熱誠及關愛，甚至加倍投入於這個宗座事業並齊力克服現有的困難，前景尚大有作為。為求能成功管理及營運這個重要的事業的確需額外的付出及財力。

如今，在您可敬的管理下，聖言會，特別是正蓬勃發展的北美會省，相當有能力為上述目標而努力，去克服各種阻礙學校發展的困境。

在聖言會成立以來為時不久的時間內在祈福傳工作已展現了足以成功擔負辦大學這新任務的活力及效率。聖言會在中國已佔有相當多重要的傳教據點，擁有許多傑出的漢學學者及科學家，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北歐和北美，享有為數眾多尊敬及認同貴會的天主教徒。

因此，聖父請您及聖言會能如同以往那樣隨時願意犧牲奉獻，同意接下這個重要、且需要長期投入及努力的新任務，聖父相信會得到你們慷慨

的允諾。

此後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將交由聖言會的手中，聖言會將可全權處理，直接面對教廷傳信部。

教廷十分關切輔大的事務，輔大的辦學可說是宗座事業，也因此全天主教徒應該要無私的給予協助，美國的教徒在以往已對這興學傳教事業展現高度熱忱，他們也應將繼續支持。

我誠心祈求上主恩典與聖父的特別賜福能引導輔大的教職員及贊助人，為榮耀上主及為中國的歸依帶來嶄新出奇的進展。

謹致以最好的祝願，再度表達本人最深的敬意——

您誠摯的僕人，

夫瑪松尼-白翁迪樞機，傳信部長

+ 卡羅·沙洛提 (Carlo Salotti)

Filippi 教區的領銜總主教，秘書

致若瑟·葛林德神父

聖言會總會長<sup>1</sup>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50, p. 53-55.